

社会变迁与

乡村革命

(1860-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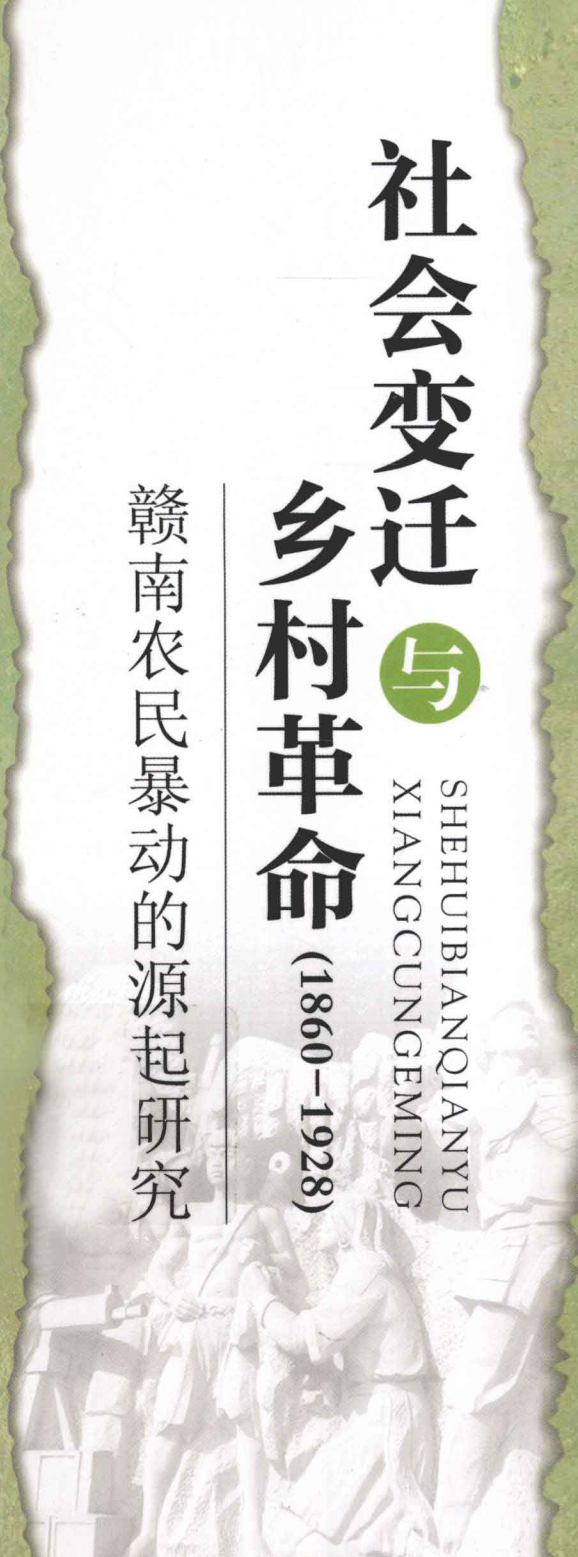
SHEHUIBIANQIANYU
XIANGCUNGEMING

赣南农民暴动的源起研究

许金华◎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社会变迁



乡村革命

(1860—1928)

SHEHUIBIANQIANYU
XIANGCUNGEMING

赣南农民暴动的
~~原~~起研究

许金华◎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变迁与乡村革命(1860~1928):赣南农民暴动的源起研究 / 许金华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210-05970-7

I. ①社… II. ①许… III. ①农民运动—研究—赣南地区—1860~1928 IV. ①K2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1057 号

社会变迁与乡村革命(1860~1928):

赣南农民暴动的源起研究

许金华 著

责任编辑:王一木

出版发行:江西人民出版社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编:330006)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01

编辑部电话:0791-88612505

E-mail:jxphwym@sina.com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90 千字

ISBN 978-7-210-05970-7

赣版权登字—01—2013—19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32.80 元

承印: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学术史回顾和本书的预期创新	9
三、使用资料分析	17
第一章 开埠通商与赣南经济	21
第一节 赣南的经济地理与传统经济的商品化	21
第二节 开埠通商与赣南经济	45
第三节 区域市场与农民生活	67
小结:农民暴动的经济背景 ——经济的恶化?	82
第二章 新政变革与政治现代化	85
第一节 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地方自治	86
第二节 “废科举”与士绅的近代转型	97
第三节 赣南的团练与民团	122
第四节 新政与赣南的社会乱象	149

小结:农民暴动的政治根源	
——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	167
第三章 绅权、官权与基层的权力重组	169
第一节 基层的权力重组之一:	
绅权的嬗变与相互之争	169
第二节 基层的权力重组之二:	
基层政权的演变与官绅之争	181
第三节 基层政治生态的流变:	
吏治腐败与政府的式微	192
第四节 “绅进官退”与乡村治理的演变	
——以乡村社区的灾困救助为例	210
小结:暴动前弱化的社会控制	
——地方坐大、官厅式微	236
第四章 国民革命与农民觉醒	238
第一节 官方动员的历史转型:	
从“延请正绅”到“扶助农工”	238
第二节 农运“过火”与国共之争	260
第三节 “清党”与农运的“合法性撤销”	280
小结:民众暴动的预演	
——农民协会的潮起潮落	299

第五章 从结构到事件:农民暴动的兴起	300
第一节 暴动前的集体归因	
——暴动发起的导因	301
第二节 暴动的社会利用之一:	
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因素	307
第三节 暴动的社会利用之二:	
社会结构的近代化因素	316
第四节 暴动源起因素的地域性分析	
——赣南农民暴动的普适性与特殊性	324
小结:农民暴动的兴起	
——结构性因素的历史必然	342
结语:革命化与现代化	
——制度缺失下转型社会的一体两面	344
参考文献	351
一、史料	351
二、著作	359
三、论文	366
后记	369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本书所指赣南为现今江西省赣州市行政区所辖各县市,包括赣县、宁都县、石城县、瑞金县、兴国县、于都县、信丰县、安远县、会昌县、寻乌县、龙南县、定南县、全南县、大余县、南康市(县级)、上犹县、崇义县等 17 个县市。清初为江西所属赣州、南安两府之区,至乾隆十九年(1754),升宁都县为直隶州,“割瑞金、石城隶之”,其辖地仍旧。^①赣南由“南、赣”两府变为“南、赣、宁”两府一州,后赣州府所辖龙南县,析出定南厅,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划龙南、信丰两县各一部置虔南厅,县级行政数始为 17 个。民国时,改厅为县,赣南所辖区域与辖区行政名最终确定,沿

^①赵尔巽:《清史稿》册八《志四十一·地理志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2165 页。

用至今。^①之所以做出如此选择不仅仅是受行政区划的人为束缚,更主要的是对上述各县情况有所了解后发现,各县之间除了地理生态相似之外,在经济上,货物、人力及各种资源的来往向来已久,形成一个稳定的区域贸易圈;政治上,“二府一州”的专属区域长期固定,并沿用至今,各属政治同气连枝,互相影响。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因过去上述各县为同一政治区划,许多资料记载往往会因此而夹杂在一起,维持赣南17县为一整体,在查找资料上多有方便。赣南毗连福建、广东与湖南三省,为四省交汇之区。因其特殊的区域位置,及南北往来的梅岭古道,为世人所关注。民初以降,赣南为南北冲突的阵地之一,仅孙中山亲自督导下的北伐就先后两次进抵该区,至国共合作后第三次北伐,始终为国民革命北进的前沿。国共分裂后,赣南成为共产党重整河山的集结地,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摇篮和共产党人执政建国的预演场,围绕着这一系列的重大变革,赣南成为学界瞩目的重点区域,而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又是学人研究的重中之重。

“农民暴动”是国共分裂后共产党人组织乡村民众进行反抗的最初形式,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起点。农民暴动的概念应有所界定。从国共分裂后乡村暴力事件的性质来看,有单纯的为经济利益而起的经济斗争,有冲击反抗地方土豪及权力机构、提出政治目标的暴力事件,本书的农民暴动指的是具有政治斗争性质的后者,即它既属于政治斗争,又采取斗争政治最激烈的形式——武力对抗,也就是说“农民暴动”就是“革命”,拥有革命的基本特征:它是突发的、暴力性质的;它关系政治演替、发生后

^①县级“厅”制于民国初年(1913)改厅为县后不存;“虔南”为全南之原名,1957年改“全南”。

带来变革。^①而之所以用“暴动”一词代替“革命”是国共分离后的共产党人以“暴动”作为当时的革命代名词,后来的历史书一直沿袭“暴动”一词直至今天,故本书一仍其旧。

就赣南而言,从1927年5月“清党”至1929年1月朱德、毛泽东所率红军从井冈山转移南下进入赣南,其间历经一年有余。期间发生的斗争事件因组织者的本土化应属内生型的暴力事件。之后,成规模的外来红军的不时介入,斗争力的源泉由单一的内生型向外力与内力相结合的方向转变,有的地方斗争甚至是外来红军一手包办完成,与最初的农民暴动有显著之别。显然,强势外力作用下的农民暴动与当地的社会结构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不在本书讨论的范畴之内,故行文的时段下限止于1928年。而之所以从1860年开始,是因为二次鸦片战争后九江与汕头的开埠通商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赣南腹地现代化的一个新时期。

围绕农民为何而起,暴动因何而生,学界一直存有争论,长期以来大体有两类观点:对革命前的社会状况进行分析所得出的“阶级压迫说”与基于过程分析产生的“民众裹胁论”。^②传统革命叙事范式下做出的相关研究是前者的代表,认为在内外交困下,中国的民众尤其是占农村大多数的下层民众在长期的压迫下已久蓄革命激情,随着共产党人的登高一呼,民众则如影随形,潜

①[英]彼得·卡尔佛特:《革命与反革命》,张长东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20页。

②所谓“阶级压迫说”与“民众裹胁论”等理论用语除其言简意赅,利于规律性认识的阐释外,还为行文提供了方便,故在此多有运用,并无哗众取宠之意。其实,学人皆知所有理论性归纳用语难免有失偏颇,然亦皆承认其在学理上可行,不可或缺,其思想必亦是如此。相关的“结构派”、“事件派”、“社会生态论”、“革命制造说”等术语的使用,意同与此。

在的革命之火得以点燃,终成燎原之势;^①后者为传统的政治事件史分析模式,对革命过程多加注意,发现革命为共产党人蕴意制造,主要代表为早期台湾中共史研究,主张民众之所以革命,乃为被“裹胁而去”。^②二者的孰是孰非暂且不论,单就分析问题的情感关照而言,即已显各有偏颇,不难发现二者所包含的国共两党在对立时期的旧时腔调,意识形态学的阴影挥之不去。双方的差异明显,除了各自的阶级立场的不同之外,研究视域的不同也是造成上述分歧的原因所在,前者是以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为指导,对革命前的社会进行分析,从结构中寻找革命的源由,在此,称其为“结构派”;后者是以政治事件作为研究的起点,从个人与偶发事件的剖析中寻找革命的成因,可冠之以“事件派”。上述二者的研究,分别开创了从社会结构着手及从革命事件切入的两种研究路径,奠定了日后革命史研究的两种基本分析框架。

从20世纪80年代起,承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党史及革命史研究开始引进新的方法与理论。社会学、人类学、社会政治学、经济社会学、革命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向党史与革命史悄然渗透。在新的理论的指引下,上述“结构派”与“事件派”的研究都有了新的突破。

首先,社会结构性因素的研究范式——“阶级压迫说”因其

①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皆循此类思维模式,如各革命根据地的通史著作、各市县党史办编修的革命史。

②参阅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中华民国七十七年);曹伯一的《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1934)》(国立政治大学高级研究生毕业论文)。另需指出的是,“民众裹胁论”实暗含一个前提,即共产党人在当地有相当的军事力量或政治存在,而内生型的农民暴动在初起时并没有这种外来的控制,而对此论持肯定者,其所依据的往往是革命政权或军事力量对一地具有统治性存在之后所发生的情事,故在对农民暴动源起的解释中,此种叙述的适用范围应当有限。

教条化备受冲击。以社会史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为指引,考察区域社会内的族群、生态等社会结构取代了经济剥削与阶级斗争的论述,据其研究旨趣与研究内容,为行文方便,姑且称之为“社会生态论”。具体为其关注的内容是地域生态文化的变迁,而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传统的研究目标。^①“结构派”由“阶级压迫说”向“社会生态论”的演进,对革命史的研究提供了两个新的启示:一是在方法论上,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进革命史研究之中,如注重文献的同时,还要加强田野的调查;二是研究目标不再局限于上层政治与社会经济,而是深入底层社区,关注区域内的“小传统”,追寻区域文化的历史脉络。然而,也许探讨革命兴起的原因不是其主要的目的,对赣南区域社会所做的中长时间段的社会生态研究成果对共产主义革命虽有涉及,但多语焉不详。^②

其次,以革命“事件”为主体的分析,因人类学的方法与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理论运用,也有了新的发展,成果众多。^③相关研究深入革命事件内部,对其过程做细致的梳理,个人的境遇与偶然的日常事件成为历史书写的主体,还原了历史的纷繁鲜活的一面,对笔者多有启发。^④然而,此类研究中大多为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叙述,赣南的相关研究尚未得见。此外,因人是

①参阅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历史·田野丛书,总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②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厦门大学2002年未刊博士论文;黄志繁:《“贼”“民”之间》,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③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里锋:《土改中的精英监控与乡村治理》,载周晓虹主编《中国研究》,第2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④[美]萧邦齐:《血路——革命中国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该书以对早期革命者沈定一的个人生活网络的描写,强调非结构性因素在革命事件中的作用,是革命“事件”描写的代表作。

事件必然的行为主体,故此类研究往往暗含“制造革命”之论,与之前“革命裹协论”殊途同归,在回答革命为何而起这一问题上,似难做出令人满意之解释。

综合视之,现有的相关研究虽贡献良多,但割裂社会结构与革命事件的传统研究路径并没有多少改变,一如其旧。其研究的视野在“年鉴学派”整体史观的考量下,皆存有局限,没有将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所谓的“缓慢的”社会史与“激进的”政治事件史相融合。正如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中文版“序言”中所说:“我们如果期望找到历史延续与变迁背后的真正原因,在探讨个人习性在不同事件中的表现时,就必须与更大的框架联系起来”。^①赣南的革命史研究亦应如此:要还历史以生动,就不能无视革命者的“个人习性”,要深入革命事件的具体场域;欲赋史实以深刻,则不能割舍“更大的框架”——社会结构,对社会的纵深背景进行分析。唯有如此,才可能得出农民暴动为何发生?为何发生在当时当地?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将义和团兴起地鲁西地区的历史生态与义和团运动的具体过程相结合,为如何解决上述结构与事件相分离提供了良好示范。^②本书将弥补上述研究中的不足,以结构—事件的分析框架将赣南近代的区域变迁与革命的兴起有效地结合起来,将革命史的研究真正纳入整体社会史的研究轨道,并力求对现有研究有所补充和完善。

革命事件源起于事发前的社会变迁。关于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的区域演变史,相关的研究众多。黄宗智在华北与长江三角洲

①[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②[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的杰出研究中,提出经济发展的“内卷化”理论,用个案实证了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延续了传统农业“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①,并据此强调了中国农业经济的近代变迁与资本主义萌芽(市场化)相背离的主张;^②彭慕兰从生态变迁的角度对运河区进行了探讨,揭示出变迁过程中运河区衰退的一面,而政府传统职能在当地的退出是其主要原因,最终被抛弃的腹地民众走向了政府的对立面;^③杜赞奇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对华北农村进行研究后,提出传统乡村存在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再加上政权“内卷化”,如脱离地方的社区网络,政府难以有效地对基础实行控制管理。^④总体上来看,这些学者的研究取向虽各有异,结论却大同小异,“停滞、衰败”是近代乡村社会的基本面相。

马若孟对华北乡村的研究则指出农村若没有重大灾荒情况下,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并不会下降;^⑤刘佛丁等考察了近代百年来(1850—1949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发现在没有大规模战乱的情况下,人均国民收入都有小幅度的增长,尤其是民初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数十年,为中国近代百年来增长最快时期。^⑥而秦晖提出的“关中模式”在显现中国乡村多样化的同时,

①[俄]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②[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③[美]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④[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⑤[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⑥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1页。

对“地权集中—农民困苦”的固有思维有所纠正。^① 温锐、游海华关于赣、闽、粤三边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及小农经济的研究,指出转型期的农民与农村经济存有强劲的适应和发展能力;^② 黄道炫对包括赣南在内中国东南乡村革命前地权情况的分析,显示过往对地权集中的程度有所夸大。^③

上述所列研究成果中,关于乡村衰败的研究大多取自于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的材料史实,从这点出发,与其说他们的研究是整个民国时期,不如说是民国后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④ 就此而言,至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共产主义革命兴起时,当时的乡村社会并没有以往研究认为的那么破败和衰落,苏区革命的亲历者周恩来事后不久在延安与斯诺的谈话中还感慨地提到:“在江西与福建,人民参加红军是带行李的;而这里(陕北—笔者)人民参军身上连一双筷子也没有,他们简直一贫如洗。”^⑤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后的革命中心在革命来临之际经济远未衰败的史实。

与经济压迫与经济衰败相唱和的是对乡村政治与文化状况分析的过度悲观。学者指出,因近代化潮流的兴起,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会产生了城乡的二元对立,城市对乡村资源的“抽吸效应”加剧,相较于城市的乡村,其生存状态正逐渐恶化。具体的结论有:传统士绅的劣化与武化,土豪劣绅滋生不断;人才

①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猜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

②温锐、游海华:《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

③黄道炫:《一九二〇——一九四〇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载《历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④如黄宗智、杜赞奇的研究以日本人于 1930 年代之后在中国各地所做田野资料;彭慕兰、林济等人的史料多取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⑤《斯诺著〈中共杂记〉选译》,辑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译丛》,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 年,第 1 页。

大量外流使乡村在文化上日趋“沙漠化”，乡村当政掌权者更多的是依赖武力的素质低下者，等等不一而足。^① 本书认可上述有关乡村社区整体社会生态趋于恶化的论断，如传统社会官、绅、民之间的平衡局面被打破，乡村社会武化割据加剧，等等。然而，现有研究中有相当的论断仍有待于检讨，如对乡村士绅名流素质的劣化及其原因的分析，乡村社会文化“沙漠化”的评述，等等，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与必要。

总之，本书的问题是通过赣南农民暴动进行社会结构性分析，在探讨革命事件因何而起的同时，对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进行较细致的分析，最终回答：清末民初的赣南社会呈何面相？这一转型时期的社会生态与农民暴动之间有何历史关联？而发生在日后共产主义革命中心地——赣南的农民暴动是否存有相当的典型与不同，还只是转型社会下，地方上演的诸多暴动事件中的普通个案而已？

二、学术史回顾和本书的预期创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量的党史档案资料得到了整理并集结出版，推动了中共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土地革命史的研究得以发展。赣南因其作为革命的中心地而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这一阶段土地革命史的研究创新体现在：一是跳出了对领袖人物的描写，开始关注根据地专项问题的研究。例如，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因其为苏区民众动员的核心而首先成为研究的

^①参阅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在乡村社会中的后果》，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 期；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载周积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重点^①,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带动了苏区经济史的研究。此外,苏区教育、苏区文艺等专门史领域在材料的收集整理、专业论著的发表上也取得了长足进展^②。二是随着各专门史研究的进步,苏区通史类的成果大量涌现^③。上述成果为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打下了基础,它不仅体现在对相关基本史实、基本史料做了很好的梳耙整理,更体现为在一些领域有了开拓性进展,如温锐、谢建社所著的《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对中央苏区前后不同的土地政策进行系统地分析比较,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土地政策的得失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知新解^④。然而,这一时期的研究在方法上主要是政策文本的表面解读,关注的重点仍是苏区的政治活动与革命斗争,对土地革命的源起问题没有涉及。

在史学新风的吹拂下,社会史^⑤成为史学研究新的理论方向,社会史研究提倡的“从下至上”的研究理念对党史研究带来

①成果主要有:许毅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孔永松的《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温锐的《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余伯流的《中央苏区经济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成果主要有:谢济堂的《闽西苏区教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陈元晖等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③成果主要有:马齐彬等合著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夏道汉和陈立明合著的《江西苏区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蒋伯英主编的《福建革命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陈荣华与何友良合著的《中央苏区史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余伯流和廖正本编著的《赣南革命三十年》(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余伯流的《中央苏区经济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④A Study of Land Revolu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1994. 5; 1994. 6。

⑤南开大学的冯尔康是大陆社会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其努力下,1986年南开召开了第一届社会史年会。两年后,南京大学蔡少卿教授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年会,社会史研究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了冲击与希望。张静如教授为此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号召^①,提出研究党史必须同时研究社会。在此背景下,90年代以后,党史研究领域逐渐由政治史、革命史向经济史、社会史拓展,“从下至上”地观察党史成为新的研究方向。而方法论上的突破随之带来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土地革命的源起问题开始成为学界研究的新方向。

傅衣凌教授开拓的华南区域社会研究团体多年来对以闽、粤、赣为中心的华南地域进行了多学科的深入研究,并一定程度上对发生在当地的共产主义革命给予了关注,虽因其研究旨趣主要在于明、清传统社会,^②未真正进入晚清近代以来的赣南社会,难以做出系统的土地革命的缘起分析,但相关研究对土地革命的历史源起提出了新的解释。饶伟新在其《生态、族群与阶级》博士论文中,对传统研究中视经济差异所致的阶级矛盾为革命起因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主张革命虽因内在危机而起,但危机的载体不仅仅是阶级与阶层间的经济差异,而是整体的社会生态出现了危机,但作者关注的始终是区域文化的分析,从赣南几百年来内部社区内的族群生态出发,而对与革命兴起联系更紧、影响更深的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及社会变革基本忽视。

从宏大的背景叙述下延至具体的革命进程,从而研究革命行程中的乡村社会是近年来土地革命研究的新动向。何友良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是这一尝试与努力的较早体现,田居

①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②主要代表作有:傅衣凌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陈支平的《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戴一峰的《闽西:土地与移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永华的《17至18世纪闽西佃农的抗租、农村社会与乡民文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